

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1949-1976）

张放¹

摘要

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并未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日渐消弭，反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要进一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首先要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有所了解。总体来看，毛泽东思想通过四种基本路径展开对外宣传：外宣网络中的大众媒体；毛泽东各种著作外文版的出版发行；对外交往中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毛泽东本人在涉外事务中的个人信息传递。四种路径的宣传侧重点、形式和影响范围各有不同，进而从不同角度参与建构了毛泽东的世界形象。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路径、世界形象

引言

在 20 世纪中叶以降的全球政治文化图景中，毛泽东思想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它不仅没有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日渐消弭，反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²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左翼阵营，在全球化进程的语境中，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

近年来，受到全球史观的影响，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出“走出国门”之趋势，不再仅仅聚焦于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语境的实践意义与价值，开始逐步挖掘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与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互动的。³尽管这一研究趋势起步时间并不算长，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整体上看，研究者集中从政党政治、精英文化和民众运动三个层面来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产生的回荡。⁴

如果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视为结果的话，那么事实上，研究者对促使这一结果形成的原因考察相对有限。因此，笔者

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进行一番了解。只有对这一主因进行梳理与分析，我们才能更充分地勾勒毛泽东思想海外传播与世界影响的整体状况。尽管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与海外发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有重要意义，⁵但这只是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一个环节，其全貌有待进一步澄清。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旨在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出版的史料，对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路径从整体上做出梳理，进而呈现出中共主导下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基本面貌。这种梳理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影响而言，无疑是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获知各种渠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的侧重点究竟如何，并据此对毛泽东思想如何具体影响他国民众这一问题做出初步判断。

一、对外宣传网络与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

毛泽东思想的对外宣传，离不开 1949 年之后逐渐建立完善的对外宣传网络。⁶外宣网络以

一种稳定的、常规化的方式，向全世界展示着新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传递着毛泽东关于世界秩序和格局的看法与认知。与后文将要提到的其他路径相比，外宣网络发挥着更加基础性的作用，争取到了一批较为固定的海外受众。

在毛泽东时代，外文刊物和国际广播构成了外宣网络的基石。外文刊物最初由国际新闻局负责，该局于1949年10月成立，隶属新闻总署。⁷最初国际新闻局所负责的外文刊物包括英、俄语《人民中国》半月刊以及世界语《人民中国报道》月刊。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后文简称“外文社”），专门负责外文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⁸随着分工的明确，外文社致力于打造一系列受众目标各异的外文刊物，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外宣宣传网络。

1951年宋庆龄牵头筹办了《中国建设》双月刊，该刊物以西方及其殖民区域同情中国、追求世界和平的进步人士、自由主义者为目标受众，帮助他们了解新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中国人民付出的努力，以通俗文章为主。⁹宋庆龄对这本刊物的编辑方针有明确规定，她要求编辑多关注人民的生活与业绩，尽量减少单纯政治说教的痕迹。¹⁰同年，由文化部对外联络事务局牵头，《人民文学》创刊，以懂英语的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汉学家和文艺爱好者为目标受众，最初不定期出版。1953年下半年归外文社管理，从1954年开始以季刊的形式出版发行。¹¹1952年《人民画报》创刊，以国际宣传为主，最初有中文、英文和俄文三个版本，旨在通过图片的形式，对新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展现，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到锦绣河山、名胜古迹、文化传统，无所不包，¹²1953年归外文社管理。从1954年开始，中国意识到创办一份能够代表中国官方观点和立场的政治理论类外文刊物的必要性，经过数年酝酿，1958年《北京周报》创刊，该刊物旨在“着重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解释我国政府

的重大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料 and 文件，并适当反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态度。”¹³

随着《北京周报》的发行，外文局逐步对已经出版的外文刊物进行调整，以期各刊物之间能够相互弥补，避免重复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由六个主要刊物组成的外刊宣传系统，各有分工与目标受众：《人民中国》取消英文版，出版日文、法文、印尼文三个版本，每个版本都依据对象国的情况制定相关内容；《中国建设》出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版，通过展现新中国建设成就，旨在争取亚非欧以及拉美地区的中间读者；《人民中国报道》以世界语出版，政治色彩较弱，以西北欧中间偏右的读者、社会主义阵营世界语读者为核心受众；《中国文学》主要针对知识精英，偏向学术研究；《中国画报》发行量最大，共有16种语言的版本，主要通过图片可视化地呈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及人民的生活状况；而《北京周报》则是官方声音对外传递的正式渠道——解释政府重大政策，展现中国立场与发展，提供相关资料文件，表达政府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与态度。¹⁴

外宣刊物逐步发展的同时，新中国的国际广播事业亦进入正轨。中国共产党主持的对外广播活动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12月3日首次以日语播出节目。1947年9月开办英语广播。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将广播电台迁至北平，9月27日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再次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负责对内广播和对外广播事务。1950年4月成立国际广播编辑部，下设华侨组、日语组、英语组、东方语组。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广播队伍中的核心力量是归国华侨，他们承担起了多语种翻译、编辑和播出的重任。1960年代，随着新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局势日趋紧张，中共加强了对外广播事业的建设力度，增加了播放的时间、语种和内容。截止1966年，对外广播共用27种外国语、4种方言以及普通话向全球播送，覆盖亚、欧、非、拉美、北美、大洋洲等区域，对外广播系统基本定型。¹⁵

1950年代,对外刊物与对外广播以宣传中国国内事务为主要内容,国际事务的报道处于次要位置。在这一阶段,外刊和广播都没有将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为外宣工作的重点,外刊的编辑主旨在于“比较有系统地报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¹⁶从而显示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广播的主要节目也聚焦于中国的文化、饮食、风景、中外交流、学说中文等内容。¹⁷此时,毛泽东及其思想尚未从幕后走向台前。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中共高层开始有意识地提升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例如,国际广播陆续开设了《巨人的步伐》、《在人民公社里》等栏目,涉及到对毛泽东相关思想的介绍。¹⁸

进入1960年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日渐紧张,国务院外办和外交局均强调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必要性,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影响全世界的人民。¹⁹在这一背景下,外宣力度逐步加强。此阶段,外宣网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对国家间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看法上。例如,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²⁰《北京周报》先后刊登了《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一系列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声明,包括支持美国黑人运动与反种族歧视斗争运动、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支持巴拿马、日本、多米尼加、刚果(利)的反美斗争等。而国际广播也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之际,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社论改编成一组稿件陆续发表,特别摘录了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点,并专门播出美国作家斯特朗的讲话,回忆了当年她与毛泽东对谈“纸老虎”这一论点时的情景,引起了海外听众的热情回馈。²¹除此之外,国际广播也用多语种播出毛泽东就各国人民反美斗争所发表的系列谈话。²²

“文革”爆发之后,外宣网络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进入高潮。外文局在1966年开始改变编辑方针,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要求外文刊物“始终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根红

线”,主要刊登下列内容:1. 体现或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2. 国内民众活学活用毛著作的文章;3. 国际友人盛赞毛泽东思想的文章;4. 毛泽东参与的活动(包括照片)、发表的声明与讲话;5. 配合文章内容选登语录。²³在此方针的指导下,外文刊物上短时间内就充满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的文章。国际广播的情况也与此相同。1966年6月13日,国际广播暂停一切传统节目,16日颁布《关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初步计划提要》,要求分专题介绍毛主席语录,首先编辑毛泽东论“纸老虎”的相关语录,办好《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等专栏,及时编发国内报刊上关于的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文章。“文革”初期,国际部就播放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全世界》、《毛泽东思想是普照全世界的红太阳》等11篇长论。²⁴从1966年底,对外广播先后开办了《毛主席著作选播》、《毛主席语录》等节目,截止1972年初,共播出毛泽东著作53篇,编发语录451条。²⁵除了专门节目外,“文革期间”的其他节目也都要以毛主席语录做开场白。²⁶

“文革”期间,外宣网络对毛泽东思想铺天盖地的宣传,有时难免会给国外受众带去“强加于人”的感受,而大量政治化的空洞表达也会让很多受众不明所以。一些国外受众明确表示,“文革”时期的宣传生搬硬套,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能够理解,对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也只是机械地刊登或播出,缺少结合案例的适当指导。²⁷激进宣传方式对受众的影响,可以从国际广播听众来信回馈这项数据看出端倪:1965年,国际广播电台总共收到135个国家和地区听众来信20余万封,创造了电台开播以来的最高纪录,显示出世界各地听众对中国主题的兴趣。但是,这一数字从1966年开始迅速下降,到1970年仅剩每年2.1万封信,创下1956年以来的新低谷。之后随着外宣策略的调整,来信数量有所恢复,但直到1976年都无法达到1960年代初的水平。²⁸可以说,“文革”期间对

毛泽东思想带有崇拜和宗教意味的灌输，缩小了中国固有的外宣阵地，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国外受众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刻板印象，在对外交往中造成了一定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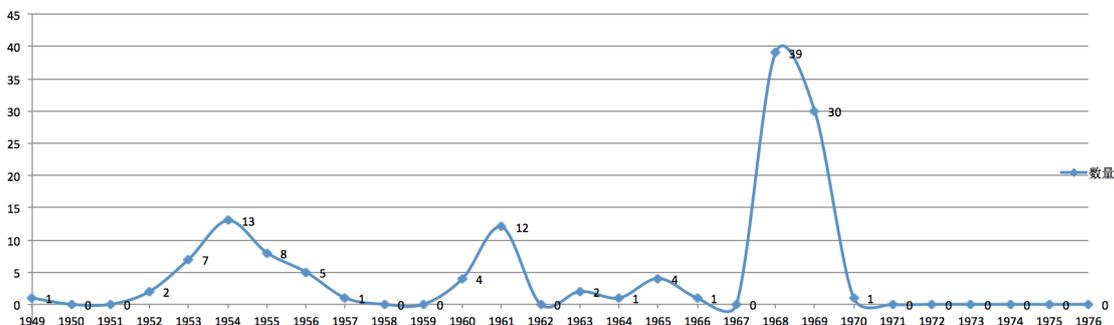
二、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与对外发行

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与发行在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著作是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载体，其发行为国外读者较为全面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可能。与其他路径相比，著作所呈现的效果最为稳定，因此中共非常重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与发行工作。据统计，从1949到1979年间，共翻译出版2105种毛泽东的著作，出版数量呈现出递增趋势，其中1961-1979年间对外发行、赠送2960万册，是1951-1960年的17倍。²⁹

毛泽东的著作中，首先被翻译成外文出版的是单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外文版最初由国际新闻局以“外文社”的名义发行出版。例如，外文社1949年出版了英、法、印尼文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0年增加了德文版，1951年增加了阿拉伯文版。随后几年，外文社又陆续出版了一批毛泽东文章的单行本，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³⁰除了外文社出版部分文章外，对外刊物上也会选登一些重要文章。例如，1950年《人民中国》英文版刊登了毛泽东的四篇著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共产党人〉发刊词》、《建立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节）、《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51年发表了《实践论》，1957年刊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³¹除了自己发行之外，中方还积极寻求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1960年3月23日对外文委办公厅委托驻瑞士使馆文化处与瑞、法、意、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办的出版社和友好组织联系，请他们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³²

根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附录所列，从1949年到1976年国内外共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外文版142种，外文社参与出版了其中的133种，另有9种只在国外发行。³³笔者对外文社出版的单行本的首版时间进行了统计（详见图1），1949到1959年共出版37种单行本，1960到1965年出版23种。1966年，中央作出“加速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决定。³⁴在这一精神的鼓动下，“文革”期间共发行71种，1968年和1969年是发行的高峰期，两年间共首发单行本69种。借着“文革”热浪，毛泽东各个时期、不同主题的文章得以面向海外全面出版发行。



（图1 1949-1976年每年首印单行本数量统计³⁵）

为进一步判断哪些文章发行覆盖的范围最广，更有影响，笔者根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中所罗列的单行本，按照在 1949-1976 年间翻译成外语的种类和出版次数进行了粗略统计，并以“版次数量”为依据，列出了排前 20 名的文章（参见表 1），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以单行本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的重点所在。从表 1 可以看出，与外文刊物和国际广播的宣传重点有所不同，发行版次和外语种

类最多的单行本文章多首发于革命战争时期，特别集中在国共对峙时期。排名前 20 的文章只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两篇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后，其余 18 篇文章均出自《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面貌，凸显其做为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多重身份，这些身份也在世界范围内构成了关于毛泽东记忆的几重维度。

序号	篇名（发表时间）	外语种类	版次数量	外文社首版年份
1	实践论（1937）	50	104	1952
2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46	93	1949
3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34	80	1957
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34	79	1956
5	矛盾论（1937）	35	78	1952
6	新民主主义论（1940）	30	65	1954
7	反对自由主义（1937）	31	58	1954
8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27	57	1960
9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25	55	1954
1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28	54	1954
1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1949）	24	52	1961
12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	28	51	1956
13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	22	48	1954
14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26	47	1953
1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28	47	1953
16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26	46	1953
17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	26	45	1953
18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24	44	1953
19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22	42	1953
20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26	42	1953

（表 1 1949—1976 年出版单行本版次排名前 20 的文章³⁶⁾

毛泽东文章单行本的多语种翻译与不断再版,反映出这些文章的重要地位。重点文章以单行本的形式呈现,为小语种翻译减轻了压力,有助于毛泽东思想更加快捷广泛地向全世界扩散。但是,单行本的分量是无法与《毛泽东选集》(后文简称《选集》)相提并论的。《选集》外文版的发行才真正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完整地展现给世界。

1950年,中央就将《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纳入规划。5月,中宣部英译《选集》委员会成立,徐永瑛担任主任,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等先后加入该委员会。³⁷截止1953年2月,《选集》前三卷的中文版已经在国内发行,此时发行英文版的条件已经形成。1953年1月19日,外文社起草《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出版的初步意见》报中宣部,《意见》提出计划同时在伦敦和新德里出版《选集》的英译本。同时表明在国内暂不出版《选集》英译本,只出版单行本。³⁸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编者对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没有信心。随后,刘少奇认为印度的印刷水平亦值得考虑,因此主要计划与英国合作。³⁹经过几个月的斡旋,中方与英方达成协议,由柯烈茨书店经理罗素代表英国共产党兴办的劳伦斯出版公司来华签约。这也是新中国委托国外翻译出版的第一本领导人著作。⁴⁰

苏联方面,斯大林也在积极促成《选集》俄文版的出版。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前,苏联就已经着手将东北书局出版的《选集》翻译成俄文,拟定出版。但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认为该版选集在文章选择、分类、排序方面具有缺点,且多有错字错句,希望等到新版《选集》校对完毕后再出版。⁴¹随后,中央任命师哲负责俄文版的翻译,并邀请苏联汉学家参与审订校对。从1952年到1953年年底,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局将《选集》一至三卷分成四册印制发行。⁴²

整个1950年代,在海外发行的毛泽东著作包括外文社以及部分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多语种单行本文章以及在英国和苏联发行的英俄文

《选集》一至三卷。如上所述,1960年前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得这一布局无法满足中共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1960年11月15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联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呈送《关于翻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报告》,认为“尽快地翻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⁴³这项工作应由外文社承担。周恩来对此做出批示,要求尽快翻译出版英、法、西、俄、日五种语言的《选集》。⁴⁴

国内正式出版的《选集》外文版是从第四卷开始的,随后一至三卷的外文版才陆续问世。为更准确、顺畅地完成翻译工作,外文社专门成立了“质疑工作小组”,专门处理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分歧意见,并聘请军事科学院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王儒林大校、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张乃兴上校、同情中国或具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外籍专家做顾问。⁴⁵为了加强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外文社于1967年成立了《选集》翻译办公室,设有德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印地文、普什图文等十余种语言的翻译小组,负责一至四卷的翻译。⁴⁶除了对内容把关外,外文版《选集》的出版发行环节同样受到重视。周恩来亲自审阅所用纸张、装帧设计和印制样本;李先念特地调拨一批棉花给东北造纸厂,为其特制纸张,并调拨内蒙的羊羔皮、金箔等物资,供精装本使用。⁴⁷印刷外文版《选集》总共使用到149种材料和工具,专门调制了印刷专用铅,甚至连翻书时有响声这样的细节都逐一克服。为了保证顺利出版,公安部还特批上海印刷技术人员的进京户口。⁴⁸

在各方资源的配合调动下,外文社主持的《选集》四卷本顺利出版。截止1976年,《选集》共被翻译成为18种外文(英、法、西、俄、德、日、阿、朝、越、缅、泰、印尼、印地、乌尔都、波斯、意、葡、世界语),合计出版763.2万册。⁴⁹另外,《选集》在国外也有左翼团体不断翻印。例如,马来西亚共产党出版了《选集》一至四卷,并且分类发行了毛泽东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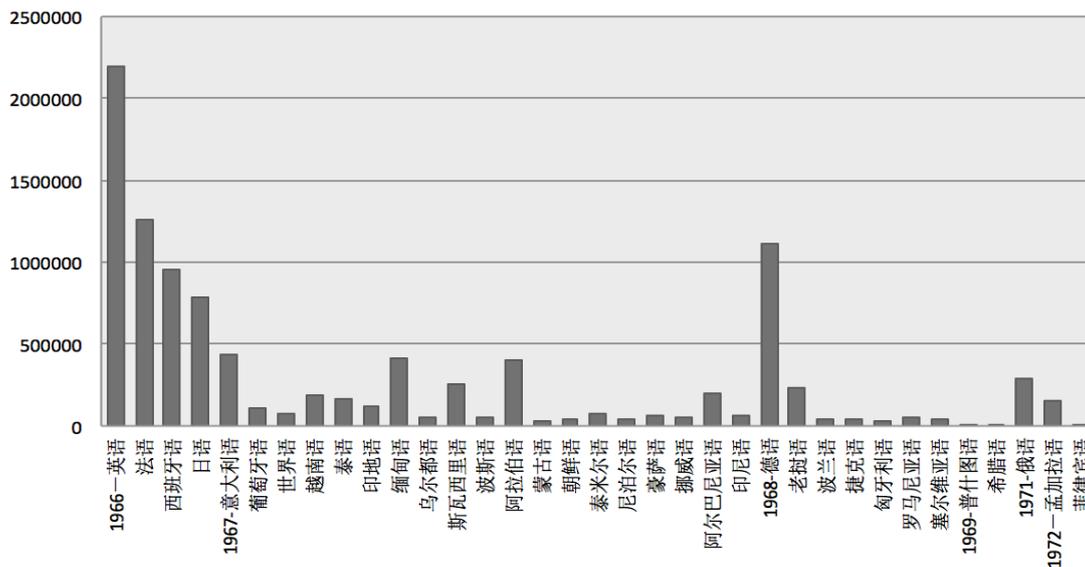
于哲学、建党建军、人民战争的著作，特别是“老三篇”。⁵⁰

除了单行本和《选集》，毛泽东思想的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载体是《毛主席语录》（后文简称《语录》）。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大放异彩，离不开《语录》的海量发行以及迅速神圣化。《语录》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演化为左翼人士和追求革命者的圣物，乃是因为它从雏形初现时就与造神意图密切相关。1960年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背下来……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⁵¹1962年，他又明确表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解放军报》响应号召，开始天天刊登语录。1963年底，《解放军报》向总政提出建议，希望编辑一本《语录》，获得批准。⁵¹

正式出版的《语录》共有四个版本。1964年5月首版发行，共分30个专题。1965年8月再版，增补了三个专题，并对前言和个别语录范畴归属进行了调整。1966年12月，林彪对《语录》前言做出修改，发行第三版；第二年，《语录》删掉了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去除了刘的痕迹，再次发行。之后又出版过小字号本与合订本，但内容未再发生变动。⁵²毛泽东本人也对语录这一形式表示认可。1965年11月毛泽东调研途经蚌埠，座谈时专门让人拿出一本《语录》给大家看，对其评价甚高：“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⁵³

《语录》虽说诞生于军队系统，但其影响力迅速辐射至全国。不过在“文革”爆发之前，关于《语录》是否面向海外发行这一问题，相关部门还是显得比较犹豫。1964年文化部便作出规定，《语录》只在内部发行，不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1966年3、4月份，外办发出通知，要求不得向外国人赠送《语录》，已经送出的，原则上要收回；6月份再发通知，语气有所缓和，提出凡外宾主动索要《语录》，均可满足，但不宜主动散发。随着“文革”的深入，激进思想渐成主流。1967年3月，外办再次发出通知，对上述通知提出批判，并要求将对外发送《语录》当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⁵⁴

中国翻译发行的《语录》主要由外文局负责。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中的数据进行统计，从1966年到1972年，外文局共将《语录》翻译成了35种文字，发行了1000余万册（详见图2）。其中英语版先后再版7次，发行量接近220万册。除了中国官方正式发行的外文版本外，很多国家也都自行出版了各自语言的《语录》。这些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出于崇拜与信仰，纷纷主动参与到《语录》的翻译工作。例如，法国在1966年1月就在巴黎翻译出版了《语录》；日本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3月，先后发行四个版本的《语录》近30万册；瑞典也从1967年到1969年，印刷了6版的《语录》。据不完全统计，其他国家共用24种语言自行翻译出版40余种版本的《语录》。⁵⁵



(图2 1966-1972年《毛主席语录》各语种发行情况统计⁵⁶)

与《选集》或者重要文章单行本相比,《语录》在记录毛泽东思想方面,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不如前两者,但它的影响范围和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却是前两者无法比拟的。⁵⁷在毛泽东崇拜的全球建构过程中,《语录》成为了重要图腾,它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使“毛泽东思想”可视化表达的角色,而简短、明了、清晰的表达方式让《语录》所承载的“毛泽东思想”更具穿透力。《语录》的出现,积极地参与了左翼革命者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塑造。例如,从1966年7月起,马来西亚共产党派专人负责收听记录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每收录一百条就出版袖珍本《语录》,并赠予指战员。部队经常举行“语录晚会”,比赛背诵语录。另外,他们还收录了200多首语录歌,供战士传唱。⁵⁸在印尼的北加里曼丹,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农民、学生、战士都得到了自行翻译的《语录》,他们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根据《语录》中的思想片段,讨论北加里曼丹的社会状况以及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目的、手段和前途等基本问题。⁵⁹

三、对外交往中的观念传递

毛泽东的文章、著作与语录是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文本,其对外发行可以视为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基本渠道。但除此之外,毛泽东思想还可以通过其他路径与国外民众发生接触,而这些路径与文本的翻译与发行相比,虽不及后者的完整系统,但却更加直观感性,能够与文本宣传形成互补。这些路径主要嵌构在对外交往的诸多形式之中。

来华访问是外国人接触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渠道。通过近距离接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来宾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初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塑造下的社会建设、民众生活以及精神风貌。国家政要访问是来华参观的最重要形式。以首都北京为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共接待364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议会和政党领袖,并先后63次举办由首都各界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这些政要来华访问,中方往往都会组织数千人到机场接机,重要来宾还会享受到十数万人夹道欢迎的礼遇。这些欢迎仪式都可以让来访者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激情与热

诚。来访者往往要在市内游览参观，在地点选择时，中方组织者会刻意安排凸显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场所共外宾参观。黄土岗、张郭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南苑红星集体农庄，红星、四季青、中越友好、中阿友好人民公社，西郊国营农场，亚非学生疗养院，东方红汽车厂，东城“五七”干校等，都是外宾参观的重要地点。⁶⁰除首都外，地方也承担着向政要展示毛泽东思想实践成果的任务。例如在上海，到访的宾客先后参观过嘉定马陆公社、上海县马桥公社、三林公社、周西公社等地方，了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上海城乡所发生的变化。⁶¹整体上讲，政要来华访问的过程控制得当，但“文革”高潮期，也曾出现过失控局面：1968年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访问时，不仅被要求挥动《语录》，还要求向毛泽东像三鞠躬，此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风波。⁶²

除了各国政要正式访华之外，其他一些途径也可以使来华者接触到毛泽东思想。与正式访问相比，下述途径所受到的规制相对有限，因此宣传效果存在更多不确定性。首先是旅游。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有限。1950年代，游客主要是来自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团以及华侨。⁶³根据公布的数据判断，每年来华旅游的人数只有1000多人。进入1960年代之后，尤其是“文革”之后，来华旅游的人数逐渐增多，拉美国家、西方国家的游客也开始陆续进入；特别是进入1970年代后，每年有数万人通过旅游团或自行来中国旅游。⁶⁴旅游者在中国的行动不是完全自由的，毛泽东时代对外宾开放的城市数量有限，本着“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原则，在这些城市中，游客能够涉足的区域也是受到限制的，这些区域就包括了反映毛泽东思想的农业合作社与公社。⁶⁵

其次是介于官方组织与自发行为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方会有意地邀请国外的记者、学者、科技工作者等来华访问，安排他们到各地参观，让他们了解新中

国的变化，从而能够逐渐形成亲近中国的政治立场，继以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新中国。在这些访问者中，颇被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恐怕要属萨特和波伏娃了。1955年，两人来中国访问一个半月，新中国的积极变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波伏娃坦率在来中国之前，对这个国度完全不了解。但经过此次访问，她看到新中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战胜了脏乱、寄生虫、夭折、传染病和营养不良，对毛泽东印象深刻。⁶⁶萨特认为，毛泽东旨在创建一个更加人道和公正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一种“深切的人道主义”。⁶⁷直到1970年代，萨特面对法国记者时，仍然给予毛泽东“以完全的器重”。⁶⁸但中国行并非都是美好记忆。1974年4月，法国几位崇拜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原样》(Tel Quel)杂志的成员受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开始了一次“朝圣之旅”。他们按照中方设计好的路线参观访问，结果却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中国深感失望，最终承认那个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毛泽东主义不过是一个“幻景”而已。⁶⁹

第三种路径是来华留学与实习。1950年1月，中国政府决定同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互派留学生，年底这五个国家共派出33名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开启了新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历史。随着交流不断扩大，来华学习的专业也不断丰富。从1950年到1966年，北京市数十所高校接受留学生4000余名。⁷⁰上海市则从1954年开始接收留学生，到1966年共有1300多人到20余所沪上高校学习。⁷¹其他省份也都有留学生前来学习。⁷²除了到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外，中方还举办了专门党校，供各国共产党员前来交流学习。⁷³来华留学是接触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渠道，留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政治活动，不断感受意识形态教育。⁷⁴政治学习对部分积极分子取得了效果。有人接受了毛泽东批判修正主义的思想，撰文对本国政府进行攻击；⁷⁵有人回国之后，开始在本土青年人中间积极宣传

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并付诸实践。⁷⁶另外，来华实习的外国人也有机会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从1958年开始，中国陆续接收来自亚非拉各国的实习生到工厂、医院、研究院工作。⁷⁷他们在中国学习技术的同时，也不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例如，中方会安排实习生学习毛泽东著作、诵读毛主席语录、参观歌颂毛主席的活动，处处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核心。但是，如此高密度的政治教育和思想灌输也引起了部分来华实习生的不满与抵触。⁷⁸

除了抓住各种机会向国外来客宣传毛泽东思想之外，中国人在国门之外也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这一现象在“文革”期间尤为明显。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具有长期接触国外民众的条件。这些工作人员在国内接受教育时的院校，如外交学院、外语学院等，都有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意识，⁷⁹他们在国内就接受了相关熏陶。“文革”之前，使馆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克制，按照国家间外交规则行事。“文革”热浪掀起之后，这些人也按捺不住内心激动，利用工作之便向使馆所在地的民众进行宣传。例如，在缅甸和柬埔寨，工作人员曾向当地民众和华侨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以及相关宣传材料；⁸⁰在蒙古，中国的大使馆重新装修，使馆外的墙壁上挂上红底金字的大幅语录，内部也以红色为基调，并放置1.5米宽、5米长的语录板，内容涉及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的批判以及对人民的颂扬；⁸¹在坦桑尼亚，外交官出席当地举行的外交活动和仪式时，也要随身携带语录，见缝插针进行诵读。⁸²

对外援助人员同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外宣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多个省市开始逐步派出医疗、工程、交通、农业等方面的援助队，到发出援助请求的国家进行支援。⁸³工作人员完成分内工作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着宣传工作：上海外派的纺织专家到坦桑尼亚后，就要求工地上树立语录牌，并到坦桑尼亚的工人中去串联，宣传毛泽东思想；⁸⁴到非洲的中国医疗队也将

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根本任务，他们用毛泽东像装饰诊所，让住院的病友阅读毛主席语录，为他们播放《东方红》之类的电影，向前来看病的患者大量赠送毛泽东的著作、语录、像章和海报，并与来自“帝反修”国家的医生展开竞争，以展示毛泽东思想的优越性以及医疗战线取得的成绩。⁸⁵

“文革”期间，留学生和华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也相当活跃。“文革”之前，留学生在政治活动方面表现得并不突出，他们认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抓紧时间学习知识，并在生活中与国外同学保持友好的关系，创造适合学习的良好氛围。⁸⁶“文革”爆发之后，中国留学生的政治热情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而日益高涨。例如，有的学生跑到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馆，宣称相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来大使馆闹革命；有的学生在参加完所在国家的政治仪式后，在举办仪式的广场一起诵读《语录》，通过这种行为向他国民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表达对留学国家的批判与不满。留学生具有政治意味的行动引起了所在国的警惕，他们派出警察对这些激进行为进行干预，遂引发冲突。⁸⁷而身处他国的华侨，追随着心中的民族愿景，主动地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学习诵读毛泽东的著作，成为了一些华侨学校课堂上的必修课；通过师生的人际关系，语录、像章、画像等象征物顺利传递到了华侨家庭以及所在社区，许多学生还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感染，加入了当地的激进组织。华侨所主持的报纸和出版社也积极配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模仿国内出版物的内容、排版风格和语言特征，印制了大量报刊书籍在当地流传。⁸⁸

四、毛泽东会见外宾中的思想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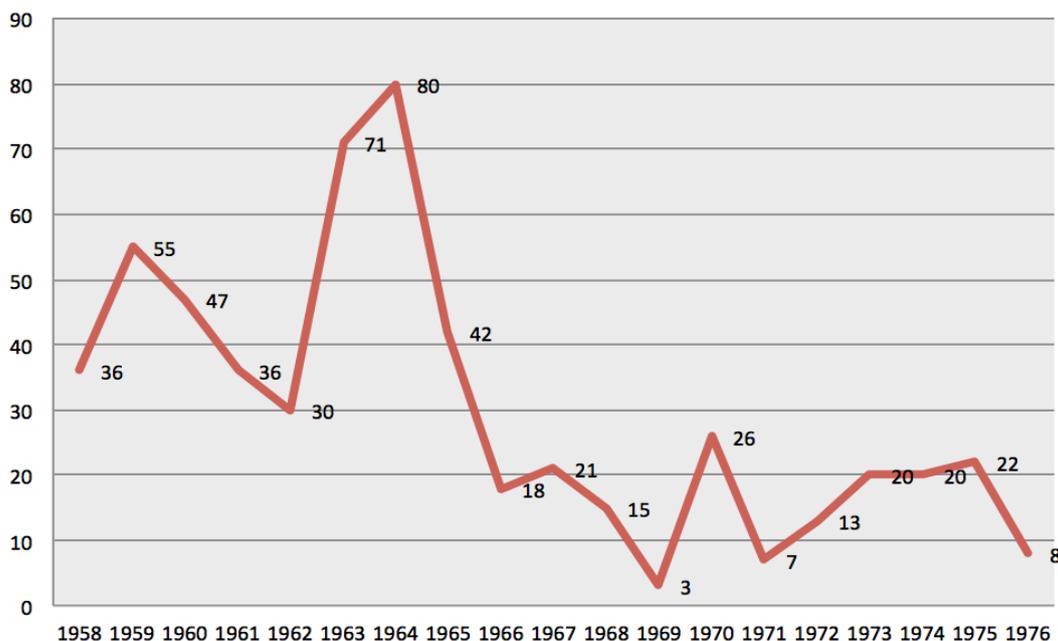
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诸多路径中，由毛泽东本人直接进行思想表达的方式恐怕是最为直接的了。除了针对具体问题交换意见、促成共识之外，毛泽东习惯在与外宾交谈或电报往

来中，表达自己对世界格局、革命历史、哲学问题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逐渐被交谈或电报对象所认知。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事活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各国政要、各界精英群体，这一路径的受众相比其他几种路径，更为有限。不过，这一路径却使受众感受到了最为鲜活生动、最富有个性的毛泽东思想的公开表达，思想的呈现与人格的魅力通过这一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毛泽东的外事活动从新中国成立后就频繁展开，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交谈与电报往来。1950年代中前期，毛泽东的外事活动主要围绕具体事务展开，比如1949年末到1950年初的莫斯科之行，他的任务是要敦促苏联方面与中国签订新约。1950到1953年间，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之间有大量的电报往来，但基本都是围绕朝鲜战场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此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苏联老大哥的地位不可撼动，中国还只是扮演着一个跟随者的角色。斯大林逝世后，中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作用日益增加，特别是妥善处理了波匈事件、化解阵营内部的

一次严重危机之后，中共和毛泽东在阵营中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提升。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所扮演的世界革命领袖角色就已经初见端倪。此时，毛泽东开始主动就世界格局与革命趋势等诸问题发表看法，不再拘泥于仅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具体事务。

在这次会议上，为了巩固共产主义阵营的秩序，毛泽东与一些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频繁会谈。在交流过程中，毛泽东就革命道路抉择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问题以及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等诸问题，传达了自己独特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针对国际形势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⁸⁹1958年之后，在国内外形势的共同作用下，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开始被着重强调。⁹⁰在“文革”爆发之前，毛泽东每年都数十次会见外宾以及与国际人士通信，特别是中苏论战期间更是达到高峰（详见图3），毛泽东利用这些机会更多就某些思想问题展开论述。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片段很快经由参与交流的国际人士向外进行传播。



(图3 1958-1976年毛泽东涉外活动次数统计⁹¹)

这一时期，毛泽东外事活动中的思想表达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讲述革命历史与理论。毛泽东通过讲述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旨在传达两层含义。首先，介绍中共胜利经验，为其他尚处于革命进程的国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1959年他在与拉丁美洲15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建议他们要同国内其他力量结盟，并介绍了如何统一战线：“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⁹²在与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的交谈中，通过回顾中、苏革命，毛泽东反复强调与农民阶级联合的重要性，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都可以运用这个经验”。⁹³其次，强调革命理论与地方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鼓励其他国家根据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之路。例如，毛泽东在与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的谈话时指出，各国共产党应“形成适合本民族的一套马列主义方针，使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⁹⁴

第二，畅谈世界格局，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呼吁打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依从。毛泽东在与外宾的交谈中，这是一个经常被论述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在与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按照政权性质对世界各国进行分类的三分法：“第一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第二类是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⁹⁵这种分类方法丰富了他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东风—西风”二分法，也为十几年后“三个世界”理论的产生埋下伏笔。⁹⁶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中，做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毛泽东在与巴西记者的谈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

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因此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⁹⁷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是将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世界格局划分的结果——做为后发国家，要时刻警惕西方反动力量的剥削与压迫，始终以革命和斗争的姿态面对各种不公与不幸。

第三，传达关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与外宾交谈过程中，时常会从哲学层面对所谈问题进行点睛式的分析概括。除此之外，他还与一些外宾专门就哲学问题展开过讨论，集中传达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理解。1959年2月，毛泽东与智利一家报社的社长马特讨论了马列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马特认为，应该将马列主义和唯物主义分开对待。与唯物主义相比，马列主义中的实践部分（如无产阶级专政）很多已不合时宜了，不应再做强调。为避免其他国家革命者不必要的误解，中国应该高举唯物主义的旗帜，而非马列主义，尤其应该回避其中的实践部分。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而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正是根据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二者之间不可分割。事实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马列主义是由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学说三个有机联系的部分构成的，不可分割，不可只对其中某一方面强调，而忽视另外两个方面。⁹⁸通过此番对话，毛泽东将其对马列主义的认知，较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传递了来自中国的践行者对马列主义体系的整体理解。

五、结语

若要进一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我们首先要对中共主导下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基本路径有所了解。

通过上文梳理可以发现，每种路径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不同路径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侧面，并依此塑造着各国民众对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历史记忆。

本文认为，在1949到1976年间，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基本路径有四种：外宣网络中的大众媒体；毛泽东各种著作外文版的出版发行；对外交往中的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毛泽东本人在涉外事务中的个人传播。其中，外宣媒体主要侧重毛泽东涉外事务的报道，重点在于宣传他对世界格局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看法，进而展现出毛泽东是如何将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国际事务的。大众传媒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出了一个正义的世界领袖形象。这一形象对于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关注国际秩序公平与正义的民众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选集》的整体出版，将毛泽东提升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家的地位，而发行单行本更多是以突出《选集》中重点篇目的形式存在。从发行最多的20种单行本来看，主题涉及军队与党的建设问题、中国政治前途问题、战争战略问题、阶级分析方法等重要方面，但最为突出的还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践论》的再版次数和语言种类都高居第一，《矛盾论》也排到了第五。单行本和《选集》都在沿着“思想家”的路径建构着毛泽东的形象，它们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国内研究者以及左翼知识分子群体。与之相比，《语录》以其特有的形式，将毛泽东塑造成为一个革命的行动者，简短、明了、有力的表达方式使其充满了情感力量和感召力，它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与前两种路径相比，对外交往中的宣传因为牵扯的主观人为因素多，其可控性相对有限，不确定性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该路径更多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最后，由毛泽东亲自主导的思想宣传确定性更强，毛泽东在与外宾的交往过程中，展现出了正义、信念、睿智、博学、风趣，有效规避了其他几种路径所产生的

负面影响。该路径直接影响的受众范围着实有限，只集中于各国政要与精英代表，不过经由这些人所形成的间接影响就不好估量了——不少人见到毛泽东，回国后就成为毛泽东的崇拜者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和宣传者。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热并未退潮，毛泽东的整体形象也由多重维度组成：他是一个睿智的哲学家、思想家；一个执着的军事家和民族主义者；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者；一个不断与主流秩序进行抗争的反叛者；一个个人魅力浓郁的外交家；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统治者……毛泽东的对外形象建构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紧密相关，而毛泽东的对外形象又成为世人理解共产党治下中国的基础——不仅关乎毛泽东时代，甚至亦包括改革开放之后。深入分析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形象乃至新中国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可能性，为研究新中国对外宣传的路径、机制、内容提供了切入点。本文仅是从整体上对基本路径作出了归纳，更深入的个案研究以及更丰富的历史细节有待继续研究揭示。

注释*

- ¹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 ² 在中国共产党的语境中，“宣传”和“传播”之间的界限非常暧昧，难以在西方学术话语的传统体系中将其做出泾渭分明的清晰区分。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宣传”更多以负面形象出现，往往意味着通过对信息的有意操控、对受众情绪的利用，以达到“宣传者”所期望实现的目标。特别是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学术界对于“宣传”所具有的力量已经可能与民主体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都有所认识。与之相对，“传播”这一概念更加强调信息流动过程中的互动性、分享性，是一个更加中性的概念。而在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他们延续了列宁主义政党

的传统，将“宣传”视为辨明理论问题、传达正确观念、教育动员民众的重要路径和手段，“宣传”是具有正面意义和积极价值的概念。而西方学术传统中对“宣传”的理解，无法完全挪至中国语境中以套用。直到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学术交往日益频繁，中国学者引入了“传播学”这一学科，才开始对“传播”这一概念逐步了解。随着与西方话语体系的接触，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宣传”这个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所具有的负面含义，学术界尝试用“传播”代替“宣传”，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代替“对外宣传”，而这一尝试也影响到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建构。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官方也放弃了使用“propaganda”这一概念，而使用更加中性的“publicity”。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宣传”一词依旧在传统脉络中使用，并未刻意对其进行调整。参见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陈日浓编著：《中国对外传播史略》，外文出版社2010年版；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宣传”与“传播”在中文语境中的含混关系，也为本文对两个概念的使用造成了不少困难。为减少读者不必要的误解和困惑，笔者在此对文章中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加以说明。本文更多使用“宣传”这一概念，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乃是基于中国语境，即主要用以描述信息发出者出于辨明理论问题、传达正确观念、教育动员民众之意图而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特别是鉴于本研究是聚焦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研究，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信息发出的主体也将其行为视为“宣传”的构成部分。基于此考量，本文用“宣传”来描述研究时段内个人和组织的信息传递行为。与之相对，本文对于“传播”一词的使用，则在更加一般意义上泛指信息的传递过程，如“海外传播”等；以及在涉及到传播学的专有名词——如“个人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

时使用。

³ 张放：《海外学者论毛泽东的世界影响：研究现状及反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⁴ 1997年，阿里夫·德里克等人召集西方一批学者，以批判性左翼的身份高调亮相，共同讨论了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充满争议性的问题，对西方主流的毛泽东研究范式提出批判。在这部具有标志性的论文集的第二部分，五位学者分别讨论了毛泽东思想对印度、秘鲁、日本、越南和菲律宾五国左翼政党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影响，开启了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全球影响这一议题的研究。参见：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中文版参见：阿里夫·德里克、保罗·希利、尼克·奈特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近年来，这一话题有升温的趋势，相关研究参见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版；Alexander C. Cook, *Third World Maoism*, in Timothy Cheek ed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exander C. Cook eds,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Wang Ning eds,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Special Iss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2, No. 1, 2015; Julia Lovell. *Mao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9; 楊海英編『中国が世界を動かした「1968」』藤原書店, 2019。

⁵ 参见：Lanjun Xu,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Alexander C. Cook eds,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6-95.

- ⁶ 本文所使用的“对外宣传网络”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逐渐建成的由对外宣传刊物和国际广播电台组成的对外宣传系统。这一宣传系统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设完善。1958年，随着《北京周报》的成立，毛泽东时代的外宣刊物体系建成；“文革”爆发前，多语种国际广播系统也已完成建构。至此，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宣传网络”已基本形成。后文将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
- ⁷ 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 ⁸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就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给政务院的报告》（1952 年 4 月 28 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47 页。
- ⁹ 参见：《宋庆龄同志主持〈中国建设〉筹备工作会议纪要（摘录）》（1951 年 8 月 30 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 页。
- ¹⁰ 参见陈翰笙、李伯悌：《回忆杂志的诞生》，《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7 页。
- ¹¹ 参见田文文：《〈中国文学〉（英文版）（1951-1966）研究》，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 年，第 6 页。
- ¹² 《中宣部审定的〈《人民画报》的任务、内容及编辑方针〉》（1952 年 6 月），《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49 页。
- ¹³ 《张闻天同志就英文〈北京周报〉创刊问题给周总理的请示报告》（1957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3 页。
- ¹⁴ 参见：《对外文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外文书刊出版规划和编辑方针（草案）〉（摘录）》（1961 年 8 月），《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8—192 页。
- ¹⁵ 参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志》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 页；《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 页。
- ¹⁶ 《对外文委〈关于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四中外文刊物编辑方针的请示报告〉》（1959 年 4 月 7 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6 页。
- ¹⁷ 参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志》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56 页。
- ¹⁸ 参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第五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 页。
- ¹⁹ 参见：《国务院外办负责同志谈外文书刊工作》（1962 年 1 月 24 日、2 月 21 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9 页；《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摘录）》（1964 年 9 月），《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2 页。
- ²⁰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82 页。
- ²¹ 参见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1、103 页。
- ²² 例如参见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3、151 页。
- ²³ 《外文局〈关于外文期刊当前急需解决的有关编辑方针方面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摘录）》（1966 年 9 月 21 日），《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5-396 页。
- ²⁴ 参见胡耀亭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6 页。

- 2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第一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4 页。
- 26 《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 页。
- 27 参见：《北京日报社大事记》，《北京周报的发展历程》，内部发行 1998 年版，第 157、159 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第五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6-97 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第四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4 页；《中国国际广播史料简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43 页。
- 2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第四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2-513 页。
- 29 参见罗俊：《回顾四十年中的十五年》，《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 页。
- 30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20、43、50 页。
- 31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15、70-71 页。
- 32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5-106 页。
- 33 参见蒋建农等著：《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71-1905 页。
- 34 参见：《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2 页。
- 35 资料来源：《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71-1905 页。
- 36 资料来源：《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71-1905 页。
- 37 参见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4 页。
- 38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33 页。
- 39 杨敏：《“伦敦版”英译毛选的诞生》，《发展》2014 年第 10 期。
- 40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40 周年纪念文集大事记（1949-1987）》，内部发行 1989 年版，第 13 页。
- 41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9 页。
- 42 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4 页。
- 43 《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1，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4 页。
- 44 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5 页。
- 45 参见汪海筠：《〈毛泽东选集〉外文版诞生记》，《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0-422 页；吴灿飞：《毛选翻译室的军事顾问》，《我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19 页。
- 46 参见刘芝田：《我在〈毛泽东选集〉翻译室工作的片断回忆》，《我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23 页。
- 47 参见罗俊：《亲切关怀 终生难忘》，《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 页。
- 48 参见石天民：《首次印制外文版〈毛泽东选集〉情况追记》，《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回忆录》，新星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7-548 页。
- 49 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5 页。
- 50 参见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 2008 年版，第 119 页。
- 51 韦梅雅：《〈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寻踪》，《炎黄春秋》1993 年第 8 期。
- 52 参见李晓航：《〈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修订与传播》，《百年潮》2002 年第 10 期。
- 5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39 页。

- ⁵⁴ 韦梅雅：《在红彤彤的世界里——〈毛主席语录〉兴衰实录》，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4—295 页。
- ⁵⁵ 韦梅雅：《在红彤彤的世界里——〈毛主席语录〉兴衰实录》，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6 页。
- ⁵⁶ 数据来源见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下，学习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69—839 页。
- ⁵⁷ 参见萧延中：《〈毛主席语录〉的亢奋与犀利》，《环球人物》2014 年第 14 期。
- ⁵⁸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 2008 年版，第 119-120 页。
- ⁵⁹ 李晓航：《〈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修订与传播》，《百年潮》2002 年第 10 期。
- ⁶⁰ 参见：《北京志·政务卷·外事志》，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0-141 页。
- ⁶¹ 参见：《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9-514 页。
- ⁶² 参见雷颐：《历史：何以至此》，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1 页。
- ⁶³ 《北京志·政务卷·外事志》，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3 页。
- ⁶⁴ 参见：《中国旅游大事记》，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7 页。
- ⁶⁵ 参见：《中国旅游大事记》，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0 页。
- ⁶⁶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陈筱卿译：《波伏瓦回忆录（第三卷 事物的力量）》，作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8-49 页。
- ⁶⁷ [法] 让-保罗·萨特：《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人民日报》1955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
- ⁶⁸ 秦悦主编：《萨特和波伏娃：对新中国的观感》，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年版，序言第 4 页。
- ⁶⁹ 参见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5-384 页；[法] 罗兰·巴尔特著，怀宇译：《中国行日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 ⁷⁰ 参见：《北京志·政务卷·外事志》，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1-483 页。
- ⁷¹ 参见：《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4-675 页。
- ⁷² 例如参见：《广东省志·外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2 页；《山东省志·外事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3 页；《浙江省外事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609-610 页。
- ⁷³ 参见：《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 年 9 月 10 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东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205-213 页。
- ⁷⁴ 参见：《北京志·政务卷·外事志》，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9-490 页；蒋华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华非洲学生“退学现象”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 年第 2 期。
- ⁷⁵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9 页。
- ⁷⁶ 参见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出版 2008 年版，第 231-252 页。
- ⁷⁷ 参见：《北京志·政务卷·外事志》，北京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92-495 页；《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9-448 页；《安徽外事志稿（1877-1987）》，内部发行 1988 年版，第 503-505 页；《南昌外事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7-128 页。
- ⁷⁸ 参见游览：《技术援助中的意识形态输出——冷战时期中国对在越南实习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外交评论》2012 年第 6 期。
- ⁷⁹ 参见陈辛仁：《陈辛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0-281 页。

- ⁸⁰ 参见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2-343、371 页。
- ⁸¹ 参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5-96 页。语录具体内容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以及“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 ⁸² 参见金伯雄：《在非洲的难忘岁月》，李同成、金伯雄主编：《中国外交官在非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5 页。
- ⁸³ 参见：《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8-455 页；《湖北外事志》，内部发行 1989 年版，第 130-134 页；《南昌外事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7-109 页。
- ⁸⁴ 参见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 页。
- ⁸⁵ 参见蒋华杰：《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外交评论》2015 年第 4 期。
- ⁸⁶ 可参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欧美同学会留前苏联与独联体分会编：《学子之路：新中国留苏学生奋斗足迹》，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年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茨卡莎”留学岁月——苏联中央团校中国班学员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年版。
- ⁸⁷ 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6 页；《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1967 年 1 月 25 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一卷，东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301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4 页。
- ⁸⁸ 参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0-103 页；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1 页；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田园书屋 2008 年版，第 107-136 页。
- ⁸⁹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30-750 页。
- ⁹⁰ 参见张放：《〈北京周报〉的毛泽东思想对外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8 期。
- ⁹¹ 数据来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至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 ⁹²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19 页。
- ⁹³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39 页。
- ⁹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20 页。
- ⁹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32 页。
- ⁹⁶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20-521 页。
- ⁹⁷ 《争取民族独立，破除对西方的迷信》（1958 年 9 月 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9 页。
- ⁹⁸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89-591 页。